

高考之路

(上接8月2日4版)

回到胡塘下村

1957年深秋,我在杭州读了将近三个月进修班,信心满满地准备考大学。不料,进修班意外关闭,徐教授一去不复返,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,怎么办?萧山工厂的铁饭碗已经辞了,厂长也说了重话,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去了。

只有回胡塘下村,找阿哥落脚,暂且维持生计,再谋出路。时值萧瑟初冬,我的心也一片冰凉,失望的沮丧伴随前途未卜的忐忑。我买票乘车,回到家乡,随身携带我的户口、档案。

阿哥在大队担任支部书记,见我回来,并未埋怨半句,交代我去县里把组织关系交掉,再把户口送到镇上。

我听阿哥的话,一一照办,然后回到村里。乡亲们知道书记的弟弟回来了,受过教育,有文化,虽然没有读过大学,但仍把我当秀才对待。村里有个祠堂,以前,全村的集体活动都放在那里,大队、支部、食堂都设在里面,当时已经开始大办人民公社,吃大食堂。祠堂里面也办了夜校,阿哥让我当教员,给村民们扫盲。他自己也来学习。我从来没有当过老师,但教教这些不能识文断字的乡亲,还算绰绰有余,毕竟在这里我是首席知识分子。晚上来上课的人不少,一时间热火朝天。

我们那里有个黄岩殿大水库,就是那时候我阿哥组织村民建起来的。修水库是大工程,要全员出工,挖土、装土、挑石,人人参与,我也不能减免。

好在我被安排最轻的活:统计工分。我是怎样统计工分的呢?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,让每个参与者接受,就是发放竹签。我站在挑土必经路口,看路过的人筐里有土,就发给竹签。一天的劳动结束,统计竹签数量,按签计分,多劳多得。一般来讲,平均每人每天能拿到20签的工分。挖土装石的人,则取平均分。

我知道乡人羡慕我,认为我干的活轻松。其实,哪里有人知道,当我轻轻松松发着这些小竹签时,我内心是怎样的悲凉。本来,我该站在大学校园里,坐在教室里,或者去野外采风写生,现在,站在山坡上,用小竹签统计工分。我认为我的痛苦与乡人的痛苦,不是一回事,心中充满着怀才不遇、大材小用的失落,情绪跌到了低谷。

此时,阿哥已经结婚。嫂子是西溪镇义门村人。5月,鲜花开遍原野的时候,听说义门村里的会计不可靠,账目做得也一塌糊涂,要重新请一个会计。后来就通过嫂子,找到我,让我去义门顶会计的工作。义门离胡塘下十多公里路,要进山。那里山清水秀。我住在一栋房子的二楼,前后空畅,放眼四望,皆是青山绿水,门口一条小河清澈流淌,叮叮咚咚地在太阳下闪着光。每天,我就打这里的水,喝水、烧东西都用它。稻米由姑妈和阿哥供应,村里人给我随便摘些蔬菜,吃喝不愁。做会计,我有底子,在萧山铁工厂向任会计学过,任会计不在的时候,还顶替了一段时间。做了一段时间,没有什么问题,村民们说外地人做账公平,这就是在表扬我。在这儿,我恍然有种忘路之远近和怡然自得的超脱感,因为一人过日子,闲暇时颇多,于是再拾书本,脑子里不时盘算着再考大学的事情。

一波三折报考路

1958年对于我是不平凡的一年。我会计工作做得顺手,村里也不能让我



该画名为《走出山门》。1958年4月,我去嫂嫂家乡义门村当会计。6月初,我得知统一考试,经过曲折反复的审核过程,总算度过了许多关口,完成考试。8月初,我接到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的入学通知书,从此走出山门,实现了求艺之梦。

闲着,不时派点任务,好歹都是有技术含量的活。当时全国都在搞技术革新,农村也不例外,我们村改良了打谷和犁地的工具,既省力又高效。乡里听说后很有兴趣,让我整理好材料,跑一趟,送到乡里。

我来到当时的棠溪乡政府,边办事,边等候,随手翻看报纸。

只有乡里有报纸,村里没有。巧得不能再巧,在《浙江日报》上,我居然看到了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启事。再仔细看,我心仪的浙江美术学院也名列其中,它刚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改名而来。我在乡政府把启事仔仔细细读了一遍,心情非常激动,好像自己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。临走前,我对乡干部说:这张报纸给我好吗?对方很爽快,一挥手让我带走。

我拿好报纸,片刻不停留,马上回到村里。如果说看到报纸的那一瞬,我决定参加高考的想法,还有感性的成分,那么在回去的路上,这个念头更加坚决,已经成为一种理性的坚定。

在房间里,我逐字逐句又读了招生启事,重点看报考的流程和时间。里面的信息真让我庆幸。1958年,中国高考的招生流程是这样的:考生先进行体检,之后递交申报材料,审核通过后给予考试资格。体检是第一关,但体检点并非随处都有,专职的招生体检队由上面派下来,只设在县级医院。我查看永康的体检,恰好截止到第二天,之后体检队就要移师其他县城。我找来日历,认真核对了一下,当即决定第二天赶往县城参加体检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从义门先回到胡塘下,到村委会,找到阿哥开证明。阿哥得知我要去报考美术院校,很支持,马上为我开好证明,证明说:胡振郎是本村肄业青年,准备投考。我怀揣证明,不敢耽搁,立即上路前往县城。胡塘下村到城区,二十多公里,我经常走,那天心中焦急,有对报考的渴望,有对

担心错过机会的焦虑,觉得路程特别漫长。

我一路疾步赶到医院,已经下午四点。这一天我走了近五十公里路。我找来找去,发现医院已经人流稀落,一副下班的样子,心里不觉慌起来。

到了招生体检的房间,我发现只有一个护士。我说自己是来报考体检的。护士既惊讶又遗憾地说:哎呀!他们刚刚已经走了。我一听,更加着急,差点哭出来,连忙解释。我说我昨天才看到报纸,赶过来实在不容易。

护士同情我,说:别急,你明天一早来,我给你检查。我们检查要医生护士配合,我一个人不能做。她的话给了我安慰和希望。我当晚找了个旅馆住下,睡不着,在忐忑中等待天明。

翌日一早,我就去体检的地方等。医生和护士给我逐项做了检查。辨识色谱的时候,我又出现了意外,两个颜色怎么都辨别不清。医生让我仔细看,慢慢来。我心里着急,越着急,越看不清。医生说:你要投考美院,色盲是不能报考的。我把昨天赶路的经过向医生描述了一遍,诚恳地说:我没有色盲,一定是太累,影响了视力。

好心的医生和护士信了我的解释。我顺利拿到合格的体检表。事实证明,我的确是因为疲劳影响了视力。否则,我怎么能成为一名画家。

我拿着体检合格表走出县医院大门,是上午十点半的光景。我从永康赶到金华,走五十多公里路,去正式报名。

浙江美院在浙江共设了三个招考点,杭州、宁波和金华。金华地处浙中,当时设金华地委,下辖十一个县,地域广大。我当晚赶到金华,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,天完全黑了,就在婺江边一个小旅馆住下,准备第二天报名。

金华考区的报名点在市中心,我把村里开的证明和体检合格表交上去,以为会很顺利。谁知工作人员检查后说:你这个材料不好报名啊,证明开得不对,应该开待业青年证明,你开成了肄

业,不符合报名条件。

我一听就急了,我报名本来就临近截止期,如果再出意外,将意味着错过今年高考。对于我来说,再等待一年,是一种惘然,一种惘然中的恐慌,伴随着遥遥无期、深不可测的不确定。

我说:那怎么办?

报名可以,你的证明只能重开。我听了答复,二话不说,立即起步,马上赶回胡塘下,到村里重开证明。

从白天走到黑夜,寂静的山路上,就我一个行人赶路,有时万籁俱静中传来一两声夜鸟的刺耳啼叫,特别惊心动魄。

回到家已是半夜三更,我一夜无眠。第二天,我开好待业证明,重回金华报名。

我再次出现在金华报考点的时候,虽然昼夜兼程,但丝毫不觉疲累。

我按要求递上三样东西:体检合格表、待业证明、三张素描作品。

收报名资料的老师认真核对完,说:噢,你怎么没有学历证明?

我一听还缺少东西,既惊又怕,加上劳累,顿时瘫软在椅子上。此时脑子一片空白,连话也讲不出,更不用想再回去补材料。我彻底放弃了。

招生老师很同情我。问了我的情况,得知我在金华一中读过书,马上让我去学校开学历证明。

这次,不用走太远的路。我到金华一中,找到教务处要求开学历证明。但心里的焦虑,丝毫没有减缓,难道我真的不该上大学?万一没有我的档案呢?他们愿意给我开证明吗?

幸好,金华一中是有历史传承的百年老校,档案管理得很好。经办老师很快给我出具了一份证明,内容包含我的简历、成绩等信息,证明我在金华一中读过一年书。

当天的报名时间已过,只能第二天再去办理手续。而次日就是报名截止日,如果再有意外,我真是没有任何补救时间了。几次节外生枝,使我情绪紧张,如惊弓之鸟,坐在小旅馆的床上,食不知味,睡不安眠,在惶惶不安中,总算打发掉难熬的时间。

时值6月上旬,天气日渐炎热,我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到招考办,是穿着一件衬衫。仍然有来报名的人,陆陆续续报好名离开。

报名材料递进去后,招生老师叫我不等,他们要研究一下。我坐在门外等待,这时感觉已经无望了,也无可奈何,只有等待安排好的命运降临。

等等啊啊,约摸两个小时后,招考老师对我说,他们研究过了,认为我符合报名条件。于是给我发了报名表,并还给我一张素描。三张素描,他们留了二张,说够用了。那张还回来的素描,我如今还保存在画室,上面有报考审阅的相关标记,是我这段报考经历的记忆凭证。

办好报名手续,走出招考办的大门,艳阳高照,回头看看这几天我数次登门的地方,回想起自己为报名走过的几百里山路,着实觉得辛苦和疲累,又着实感到心情轻松,回到旅馆好好地睡了一觉。

我的1958年,我的高考之路,我遇到了这么多的好人,无论是当年还是后来,每当我想起这段经历,我都感慨万分。

凡十八岁以上,无论贫富贵贱,有能力者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。毛主席的这条指示,让我这个穷小子真的梦想成真。

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